

丙

#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三年·兰州

## 編 輯 凡 例

一、本选輯刊印的目的在于征集、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征集、撰写資料工作的繼續开展。

二、本选輯所选的資料，主要是从清末到解放以前各个时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事实（也有一部分涉及到近百年来有关民族事变和自然灾害等調查研究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撰稿人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所以本选輯作为不定期刊在内部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三、本选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选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 目 录

- 朱紹良在西北 ..... 拜襄华 張鶴鳴( 1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活动情况 ..... 石 琳( 22 )  
抗战期間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活動的回憶 ..... 苏耀江( 53 )  
三民主義青年團在甘肅的始末 ..... 張开选( 68 )  
民社黨在蘭州 ..... 秦崇模( 88 )  
李鏡清被刺記聞 ..... 馬培清( 92 )  
關於李鏡清之死 ..... 馬廷秀( 96. )  
陝軍截奪陸洪濤軍火記實 ..... 邢邦彥( 102 )  
李長清、包玉祥之死 ..... 魏紹武( 106 )  
雷馬事件中之馬文車 ..... 張乃恭( 110 )  
黃得貴在固原的軍事活動及其被殺經過 ..... 夏叙九( 117 )  
甘寧青三省合拒孙殿英戰事的回憶 ..... 馬全良( 122 )  
一九三二年蘭州中上七校  
    教职员索薪運動 ..... 龙右天 牛海秋( 128 )  
解放前夕蘭州市各院校學生反對  
    “建設公債”的鬥爭 ..... 郭維屏( 134 )

郭寄嶠利用“甘肃省軍公教合作社” 名义斂財內幕	賀笑尘(144)
兰州淳化閣帖石刻遺存記实	趙元貞(148)
隴上旧剧瑣忆	水梓(150)
从甘肃的实例看反动統治 时期的田粮制度	潘錫元(156)
解放前甘肃的皮筏运输業	王信臣(167)

## 补充与訂正

对第一輯《馬占鰲的起事与投降》(馬培清口述) 一文的意見	李孔炤(178)
对第一輯魏紹武先生所写《陸洪濤督甘始末》一文的補 充訂正	李孔炤(179)
关于我所写的《涼州事變与馬廷勦》一文的 訂正	馬培清(180)
对第二輯秦懷璽《孙連仲在甘、青的一鱗半爪》 一文的訂正	孟企三(181)
关于第一輯徐兆藩、裴建准《清同治五年蘭州 督標兵變》一文的更正	(182)
关于第二輯韓定山《張廣建督甘七年》的更正	(182)

## 专載

关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	.....
.....	政协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83)
全国文史資料工作会议总结	(200)

# 朱紹良在西北

拜襄华 張鶴鳴

## 一 朱紹良任甘肅主席时的地方情况和一般措施

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南昌决定：令杨虎城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调甘肃省府主席邵力子接任杨虎城兼任的陝西省政府主席；另调朱绍良接替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时任第六路总指挥，以甘肃地处边陲，民族复杂，地方秩序混乱，顾虑政令推行困难，一再恳辞。蒋介石以一时无适当人选，坚令前往。朱乃当面請求：暂准他到甘肃试办三个月，如果做不通时，望把他仍行调回。经蒋介石答应后，朱遂于是年五月到兰接任。同年十月，蒋又在兰州成立了驻甘绥靖公署，命朱绍良为该署主任，仍兼甘肃省府主席。

朱绍良一到任，即调来胡宗南第一师的第五团杨德亮部，和另一宪兵营驻紮兰州。当时甘肃情况，确属复杂，民族的问题和浓厚的封建势力，到处存在；地方军阀把持地方行政，各据一方。馬步青的骑兵暂编第二师驻武威一带，馬步芳的三〇〇旅韩起功部驻张掖一带；二九八旅馬步康部驻酒泉一带；邓宝珊的新十旅李贵清部、新十一旅石英秀部驻定西、靜宁一带；馬錫武的东路交通司令部所

属的一个团驻华家岭、界石铺一带；鲁大昌的新十四师驻岷县渭源一带；杨渠统的陇东绥靖司令部所属部队，驻陇东各县。这些部队的饷项来源，主要靠就地拨款。当时在甘肃全省七十余县、局中，凡是地方军队所驻的县分，县长和地方行政人员，多半是由驻军保荐的。地丁、钱粮，任意附加；临时派款，亦所在多有。土匪乘机横行，商旅裹足，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朱绍良主甘以后，为了进一步树立伪中央的威信，表现他不负主子的恩遇，首先，以统一甘肃的军政为务。他的办法是：一、极力和地方士绅拉拢，建立私人关系，以取得他们的协助；二、对地方军队，则采取联络头领，建立私人感情的办法，以取得拥护；三、进一步和地方军队首领，分别协商，各县县长由省政府委派，钱粮税款，须按省政府统一规定，不得任意附加，收到的款须一律解交财政厅。关于地方军队所需军费，由省政府统一拨发；四、地方各军的编制和粮饷，应分别报请伪中央军政部核定。这样以来，甘肃的割据局面，便在表面上统一起来了，政令能下达了，治安也较好转了，但人民痛苦并未减轻。

那时甘肃各地，还公开种植鸦片，吸食极为普遍。不但地主官僚，吞云吐雾，即一般商业行栈，都烟具齐全，成为应酬往来客商的必需品。不少肩夫脚户，每到旅店打尖或夜晚住宿，亦以吸食鸦片为常。每到日落西山，兰州城中心的城隍庙（今工人俱乐部）内，就可看到三三两两，横陈竖臥在屋角簷下的人，公开吸食鸦片。其他如娼寮妓院，更以鸦片为招待客人的主要品。大街小巷，随处可看到门口悬挂着“清水淨烟”四字灯笼的烟馆。最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城内学院街（武都路）还有一个“甘肃省禁烟善后局”，该局有总办、会办等负责人，都系政府简派的，下面还有不少工作人员，

在外县还有分支机构，实际却是对吸食、贩鸦片者征收所谓“禁烟善后捐”的税收单位。据说当时甘肃省的财政收入“烟亩罚款”和“禁烟善后捐”要占半数以上。因此朱绍良到甘后，这个单位还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才结束，而代之以“甘肃省禁烟委员会”（起先在左公祠，后在五泉图书馆），这个组织也相当庞大，有常务委员三人，秘书、科长等工作人员也有一大堆，但仅作了些“戒烟”方面的工作，如设立戒烟所、训练戒烟人员和制发戒烟药片等，这都是些消极措施，所以收效不大；对私商勾结军队贩运鸦片及陇南山区的私种罂粟，却一直沒有根绝；即朱绍良的老婆华德芬，也一直是兰州的“头号瘾客”。

## 二 生活和用人

朱绍良从来自命不凡，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自许，并推崇黄老之学，表示与人无争。事实上这都是骗人的把戏。他自己知道争不过胡宗南，所以对胡就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正因为他能与胡宗南不争，才能在西北先后稳坐了十二年。朱绍良自己虽标榜清高，不额外需索，但他和他的老婆孩子，生活都十分考究，他自己，烟非加力克不吸，酒非白兰地不饮，他老婆华德芬鸦片嗜好极深，且非云南土不过瘾。至于他的五个女儿更因过度放纵，淫逸骄奢，声名狼藉。因此他就不能不有意识地放任其老婆大开后门，巧取豪夺。华德芬大量收受贿赂，放高利贷和公开走私，都是当时兰州人所共知的事。在解放前轰动兰州的一件大贪污案中，被枪决的伪八战区兵站总监班淦，便是因为给华德芬敛财而被牺牲的一个例子。朱绍良主要依赖内助为其聚敛，以供挥霍，因此他对老婆颇为

恭顺，当时兰州官場有“朱绍良怕老婆”的说法。

谈到朱绍良的用人，由于他自己自负“才高”，对军事政治都有一套，认为不容易找到比自己更为高明的人，同时还认为部下有才，难以驾驭，所以他主张“用奴才，不用人才”。不问才学如何，只要对他“忠诚老实”，就为合格。他还有一个毛病，凡是找他求工作的人，他总要表示慎重，各方考核，迟迟不予安置。因此，当时大家给他一个绰号叫“朱半年”。他还经常讲所谓“气节”，对蒋介石抱“士为知己死”的忠忱，从而也要求部下都对他忠诚。他初来甘时，以李勉堂为省政府秘书长，李勉堂系他陆军小学和中学时代的朋友，他不得志赋闲时，李曾给他以经济援助，以后李又介绍他到陈铭枢的十一军当过参谋长，他们两人认识很早，友谊甚笃，所以对李是比较客气的。驻甘绥靖公署成立，又以李为绥靖公署参谋长兼省政府秘书长。一九三四年九月，李因赴飞机场送客，在返城途中，复车殒命。遂又以翁燕翼为省政府秘书长，章亮琛为绥靖公署参谋长。翁系福建人，最善迎合朱意，唯唯诺诺，曲意顺从。惟贪财好货，在翁两任甘肃省府秘书长任内，苞苴公行，都装入翁的私囊。章亮琛曾任第六路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平庸无才，遇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章唯一的长处，是能绝对听朱的话，所以很合他的胃口。朱绍良第二次任甘肃省府主席时，虽曾一度以丁宜中为秘书长，但不久丁被特务密报，以其爱人王德谦有“共产嫌疑”，为蒋介石勒令离职。丁离职后，仍以翁燕翼为秘书长。一九三八年第八战区长官部成立，朱蝉联长官职位，仍以章亮琛为参谋长。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朱绍良带同章亮琛前往参加。章身体肥胖，且素来精神萎靡，正当开会的时候睡着了，一时鼾声大作，引起了会场上的注意。蒋介石正主持会

場，极为震怒，故意问章：“在五原战役中傅作义的步兵和門炳岳的骑兵是怎样配合作战的”？章瞠目不知所答。会后朱、章回兰，接到据说是蒋介石亲拟的电报，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这样人如何能作参谋长？闻兄专好用‘拉污’之人……”。朱绍良于不得已之下，把章亮琛免职。调第八战区兵站总监张鑑桂继任参谋长，张曾任第三军的参谋长，对朱的性格十分熟悉，当然他们是很能合拍的。

朱绍良用人好用奴才，他对部下也是封建主对奴才的态度，稍不如意，他就毫不客气，甚至拳脚交加。象上面说的班淦，本是他老婆华德芬的招财童子，对他当然奉命唯谨，但也常常难以避免他的‘耳光’，于此也可证明朱绍良的‘宁静’也不过是一派伪装罢了。

### 三 策划解决孙殿英和阻击红军北上

蒋介石对所谓杂牌军队，自来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于利用后设法消灭。孙殿英当时盘据山西边境，拥有五六万之众，在地方筹粮要饷，一味自由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一九三三年由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主持)发表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孙率部西开；而南京的蒋介石同时又密令朱绍良在西北沿途截击，务将孙部消灭。孙殿英也看透了蒋介石的这个阴谋，但他却自持兵力雄厚，将计就计，要乘机先占领宁夏。他以先头部队丁綽庭师向宁夏假道，以夺取宁夏省城，又以芦丰年、刘月亭等师进占宁夏各重要据点，企图席卷宁夏全境。当时宁夏主席为馬鸿逵，对孙殿英的狼子野心，亦早有准备，集结了全省兵力，以作背城借一之计。

朱绍良于接到蒋介石电令后，即在兰州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部署截击孙殿英的军事。青海省府主席馬麟、三十五师师长馬鸿宾和驻在甘肃的各军事将领都参加了会议。朱绍良即席提出援助宁夏问题。他说：孙军西来，宁夏省城有被包围危险，倘馬鸿逵抵抗不住，使宁夏为孙所占领，继续向甘青前进，则西北全区均受威胁，我们必须不分畛域援助宁夏，馬麟、馬鸿宾等都一致表示愿出兵援助馬鸿逵，共同击溃孙殿英。会后，馬鸿宾的部队，首先由金积、中卫等地出动，驰赴银川增援；馬麟也派兵两旅，开赴宁夏；朱绍良又令第一师胡宗南部的旅长袁朴率领第四团罗历戎部、第五团杨德亮部、骑兵团蔡仲部，开赴宁夏支援馬鸿逵。

孙殿英的丁綺庭师围攻宁夏省城两个多月，未能攻下。因各增援部队开到，丁师腹背受敌，退逃无路，就投降馬鸿逵。孙殿英的其他部队如刘月亭、芦丰年、于世铭等分别接洽投诚，经伪军事委员会分别改编刘、芦、于等部为独立旅，直辖于伪中央。孙部呂存义旅开到兰州后，由胡宗南的第一师改编了，李纯华旅被交械编併。孙殿英见大势已去，偷偷地逃走无踪。至其后方械弹辎重，都为閻锡山所接收。朱绍良完成了消灭孙殿英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朱绍良为了堵截红军北上，指挥第三军军长王均率第七师曾万鍾部驻天水、临洮一带；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协助新十四师鲁大昌部驻甘南岷县一带；三十七军毛炳文率第八师陶峙岳部，第二十四师李蔭部驻陇西、定西一带；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驻平凉、固原一带；第六师周巖部和胡宗南的第四、五两团驻兰州附近。一九三六年冬，王均由天水飞兰，中途飞机失事毙命。

当红军经过陇南及陇东地区时，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只有经过甘南地区时，新十四师鲁大昌的部队和十二师唐淮源的部队与红军

有几次接触。红军经过陇东固原一带时，曾被关麟征的部队阻截，经过短时间战斗。惟徐向前将军率领的红军进入河西时，被骑五师馬步青的部队及馬步芳的韓起功、馬步康两旅截击，战斗情况较为激烈，使红军受到相当损失，俘虏了红军几百人，送到兰州后，朱绍良挑选了其中的大部分青壮年，补充了他的特务营，其余老弱分别遣散了。

#### 四 专任綏靖主任和“双十二”事变前后

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时，对驻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的借故挑衅、阴谋诬蔑等事件，对策强硬，使日军感到头痛，于是威胁蒋介石要求撤换于学忠。蒋介石深怕惹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竭力敷衍，乃商得于学忠同意，将他调西北接替朱绍良的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则专任驻甘綏靖公署主任。

朱绍良为蒋介石嫡系，于学忠出自东北军，由于系派不同，他们在甘肃分主军政，鸿沟很深。朱、于之间，很少私人往还，于访朱一次，朱始回拜一次，朱从未主动访过于。两人見面完全是一派客套，各存界限。于学忠的五十一军，本归綏靖公署指挥，但于学忠派到綏署的联络参谋，从未得到任何军事情报，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曾亲往綏署询问，而綏署参谋长章亮琛亦严守机密，一点也不告诉。因此于学忠和刘忠干都对章亮琛不满。当时驻兰州的伪中央部队经常和五十一军发生小冲突，双方均无法制止；馬步芳和馬步青驻在河西的部队，在朱绍良的支持下，把持各县行政，使于学忠的政令，在河西地区无法推行。因此于学忠的主席职权，一面受制于朱绍良，一面又割裂于馬氏兄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到了西安，召集军政首领会议，朱绍良、于学忠都奉召到达西安开会，不久即发生了“双十二”事变。据朱绍良自己说：他在西安住西京招待所，当“事变”发生的那晚，外边枪声乱响，并对着招待所一阵射击，他当时不明外边情况，只有躲开门窗，避在室内，不敢妄动。枪声停止后，有一个排长带着几个人进了他的住室，他当时心想：这可能是来抓他的吧！不料这位排长并没问他是什么人，头一句话是：“住的地方很阔，一定很有钱！”他才把心放下了，跟着答言说：“这是你们杨主任招待我们的。钱是有，我身边带的有限，只有一百八十元钞票”，说着就把钱掏出来，交给这位排长。朱绍良有一件獭绒皮大衣挂在衣架上，这位排长看見了说：“这件大衣很好”，朱也馬上送给了。后又看見一个小皮箱，要打开看，朱立即给打开了，这位排长翻了一下，因为都是些衬衣之类的普通衣物，丢下走开了（这是朱绍良自己所说，不一定是实际情况）。朱绍良一直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另据他自己吹嘘，他在软禁期间，没有什么恐惧，惟警卫人员每到交班后，到各人住室查看，这曾使他一度意识到被暗处死的可怕。因为有天晚上，警卫接班时，变了方式，喊他们大家到室外集合，他以为是要把他们集体处死，感到死神将要降临的恐惧，一时思想上交织着阴森和酸痛。后来他又想，横竖是死，何必叫人另费周折呢？他就告诉警卫：“你们要收拾我，就打在这里，我是不出去的。”警卫笑了说：“我们为查点方便，才請你们到外边去，既然如此，不出去也就罢了。”最后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才恢复了朱绍良的自由，与蒋、张同机到了洛阳。

兰州市在“双十二”事变发生了的那天晚上，约七点钟左右，水北门一带枪声乱响，绥靖公署的官兵们正在开饭，一时莫名其妙，

不知发生什么事故，仅据报城內和四郊都布滿了东北军的岗哨，戒备森严，城門也禁止行人出入。于是由副官处長拜伟（襄华）亲赴五十一军军部找其参谋长刘忠干，当拜伟到五十一军军部门口时，兵卫森严，且架设枪炮，如临大敌。及至見了刘忠干，拜伟就问：“有什么事，等两位头子（指朱绍良和于学忠）回来再说，闹出事来不好”。刘说：“这是非常之变，我们是响应西安的行动，我们已经晚了些，西安是昨晩午夜就发动的”。拜说：“既然如此，总要以地方为重，不要发生骚扰，使地方糜烂。”刘又说：“两方面真要打起来，那也很难免了。”话后刘忠干叫拜不要走，怕出去发生危险，此时拜已意识到事变的严重性，乃向刘要求，暂住五十一军军部。

当晚东北军一部分攻进了绥靖公署。该署卫士曾进行抵抗，但寡不敌众，除死亡了几名外，全部缴械。存在绥署的物资亦被抢掠一空，章亮琛等绥署处长以上军官，均被拘留在下水巷六号东北军招待所內。只有军需处处长王式辉是晚在西城巷绥署参议杨继高家，被五十一军军部的某队长跟踪，连同杨继高一起被枪杀在杨家。东校場駐的胡宗南第一师的骑兵团，被攻击缴械，团长蔡仲也被打死；又收繳了省会警察局的全部武装，逮捕了警察局局长史铭和国民军训处处长胡维藩。

在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甘肃省府秘书长周从政，正准备在次日开公民审判大会，并要当场处决几个人，据说其中有史铭和胡维藩，到了当天得到释放蒋介石的消息后，认为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遂停止开会。这天下午于学忠从西安返兰，馬上释放了史铭和胡维藩，并把打死王式辉的某队长撤职了。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押了张学良，驻在西北的东北军，人心汹

汹，蒋介石又把朱绍良派到陝西凤翔，集结驻甘的蒋军，积极部署攻击东北军的军事，直到七七事变后，朱绍良才离开了凤翔。

## 五 朱 谷 关 系

朱绍良和谷正伦于民国初年在贵州就是同事，朱绍良当时任王文华部的参谋长，谷正伦任王部旅长，意見就不融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谷正伦接任了朱绍良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朱就专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他们在交接时，因私人利益矛盾，朱绍良的秘书长翁燕翼又在中间传话不实，曾引起双方很大的不快。谷不仅对朱绍良的政治作风和行政措施完全否定，他更露骨地以法西斯作风大张旗鼓地改弦更张。有一个时期双方矛盾愈来愈深，形成军政绝对分治、各行其是的局面。

朱绍良治甘的政治口号是：“安定中求进步”。他认为甘肃偏处西陲，地瘠民贫，军阀割据，汉回分歧，秩序混乱，他为实现统一，首先要求贯彻政令，他一面打着伪中央的招牌，一面依仗着胡宗南的反动军队，对甘肃地方武装采用利诱势迫的手段，使其先后就范。对少数民族，故意制造内部分裂，以便掌握，又极力培养馬步芳为镇压少数民族的工具，使少数民族处在高压下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甘肃局面暂时呈现统一和和平的假象，朱绍良还自认为他的手段高明，不可一世。其实甘肃人民生活愈形贫困，落后情况有加未已。谷正伦认为朱绍良因循敷衍，沒有魄力，所以他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进步中求安定”，故意与朱标异。谷还为表示自己求进步干劲大，在朱任内所派的县长中，凡是为朱绍良所亲信的都撤换了，并且还枪毙了陇西县长黄忻，一时雷厉风行，表面上看起

来谷不瞻徇情面，实际不过是有意给朱绍良以难堪而已。

一九四二年，谷正伦乘物价暴涨，法币贬值的时机，成立了甘肃省物价平衡委员会（下称平价会），把他的亲信余仲箎派为该会经济纠查队队长，对商人储存的货物，一律登记，不准私自出售。余仲箎挨户搜查，闹得商民惊心吊胆，人人自危。因为货物一经登记，即由平价会评定最低价格，由该会尽先提取，其他机关单位经平价会核准，仅能提取极少数货物。平价会把大批登记了的货物，集中送仓库储存起来。过了一个时间，由甘肃省府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合作社，按最高价格零售出去，获得了巨额的非法利润，谷、余和三青团的寇永吉等借此发了一笔“国难财”。由于平价会“评价”的关系，商人再不愿到沦陷区去办货了，一时后方物资大感缺乏，物价更加上涨，人民怨声载道，谷正伦只好取消了平价会。这是谷正伦自认他比朱绍良敢干、能干的一件“杰作”，但结果是他自己发财，而商民大遭其殃。

一九四二年甘南临洮、岷县等地灾荒严重，民不聊生，谷正伦又不顾人民死活，大施其残酷压榨的政策，尤以征购征实的任务最为严重。一般地方官吏乘机勒索，甘南人民实无法生活下去，迫不得已起来反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救灾抗粮”。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灾民有十万余人，声势浩大，由甘南各地汹涌澎湃，发展到兰州附近，群情激昂，有进攻兰州之势。谷正伦慌了，他本来因与朱绍良政见不合，很少往来，此时不得已就赴城外邸家庄朱的私邸找朱面商办法。谷正伦向朱绍良说：“乱民势力很大，有进攻兰州之势，我为保卫兰州安全，拟加固兰州外城城垣”。朱绍良对谷一向的独断专行，极为不满，而且认为谷没有政治头脑，简直是胡闹，现在闹出事来了，才来找他，为了显示他比谷镇静而有办法，

对谷说：“战区司令部驻在城外，如果战区驻在地保不住，城还能守吗？修城垣的事，太用不着了。”朱绍良还以虚伪的关心人民的态度，并表示自己宽大，继续说：“这是灾民不是土匪，我正在设法劝告他们回家，各安生业，我不忍使用大军进剿”。接着他又说出了实话：“万一劝告不听，那时再派大军进剿，很快就可以解决，你不要怕”。随后朱绍良果然采用了欺骗、麻醉手法，散发了劝告灾民书，还张贴了这类布告，这些东西本来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表现朱绍良的又一次欺骗罢了。

正在此时，兰州城内发现了许多标语，有：“打进兰州城，杀尽南方人”；“打倒谷正伦，拥护朱绍良”等词句，这显然是起义灾民所张贴，为了利用朱谷固有矛盾，有意扩大加深，使其自乱脚步。果然这些标语发生了作用。不仅朱谷之间矛盾更加深了，而且引起了蒋介石对朱绍良的怀疑和不满。此后不久，蒋介石曾给朱绍良电令，饬朱将起义灾民限期剿平。朱于是派康庄、李英、盛文、吕继周、李世龙、张占奎等师和地方团队，分头进剿。这些揭竿而起的灾民，都手持戈、矛、刀、枪，那能抵抗得住这些武器精良的匪军呢？因此前后只一月多的光景，便把十几万灾民镇压下去了。

在这次事变中，朱绍良有意识给谷正伦显示他的稳健有办法。表面上谷正伦对朱表示敬服，但骨子里却对朱绍良更加不满。谷正伦鉴于他过去一套生硬手法，往往会引起反感。从此他稍变以前作风，有事在形式上先找朱商量，实际上他有他自己的做法。他极力拉拢地方上的土豪劣绅，经常告诉新上任的县长，要他们登门拜访当地声高望重的人。谷正伦还有意迎合朱绍良，把已撤职的朱任内县长何世英找来，提升为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表面上似乎朱谷关系改善了，实质上还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